



蘭嶼原住民研究與數位典藏 的反思及展望

林嘉男 ◎ 財團法人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專案企劃

謝來光 ◎ 財團法人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專案經理

夏曼·藍波安 ◎ 財團法人蘭嶼部落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 原住民研究與數位典藏對蘭嶼原住民發展之意涵

理解蘭嶼近代一百年來的發展歷程，如同閱讀一本橫跨眾多學科的百科研究全集，蘭嶼因具有豐富的人文與自然素材，成就出大量的研究調查史料，也意外地記錄了蘭嶼各個時期的發展與變遷過程。但另一層面而言，立基於達悟族主體的人之島（Pongso no Tao）歷史記憶，因受限於缺乏文字撰述與專業研究及傳播能力，而只能就各時期的研究記載，從他者的訴說與筆觸裡頭，零星地拼湊出近似達悟的說話語調，而未能建構完整的蘭嶼原住民主體觀點。學術研究與蘭嶼社會的互動關係，即是在此一複雜的主、客認知混淆關係之上，影響著蘭嶼當代的人文社會演進。

自 2002 年以來，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的展開，帶動了一連串的知識拓展與數位整合學習趨勢，原住民豐富的文化內涵理所當然也成為數位典藏計畫的發展要項。分散於各收藏機構的蘭嶼達悟族相關資料，也在此計畫的推動下，展開了數位化、公眾化與加價值的社會過程，豐富了臺灣大眾社會對數位知識的發展需求，同時也改變了蘭嶼社會在外部資源取得上的侷限，讓蘭嶼大眾有更多元的途徑可接觸、學習到列於典藏資料庫中的達悟族的數位資料，開創蘭嶼社會知識生產與交流的公眾空間，同時也再次突顯出原住民主體在學術研究與數位典藏中的角色課題。

基於上述，本文以蘭嶼達悟族的在地觀點出發，對過往蘭嶼原住民研究與數位典藏計畫發展進行廣泛地一般性回顧，提出學術研究者與數位典藏機構之外的考量面向，對於原住民數位典藏與研究發展提供進一步的思考與補充。

✿ 蘭嶼原住民研究之演進歷程回顧

歷史上關於蘭嶼的文字紀錄，可追溯自 1644 年熱蘭遮城日誌，一直到 1877 年（清光緒 3 年）皆有相關的文字記載（注 1）。而實質踏上蘭嶼土地，進行完整的第一手研究調查，則始於

1897年日本人類學者鳥居龍藏的踏訪，此次踏查也是蘭嶼首次的影像紀錄，產出第一張蘭嶼的手繪地圖，也是蘭嶼後續學術研究調查的開端（注2），同年11月，任職於臺灣總督府的伊能嘉矩亦前往蘭嶼踏查，採集許多達悟族的文物與器具，為達悟族在日治初期重要的文物史料。1903年，蘭嶼發生「美船事件」（注3）之後，日方正式於蘭嶼設立駐在所，並開始有正式的官方文件紀錄（注4），同時也出版官方的第一版蘭嶼地圖（粗繪），同時進行各社的人口資料普查，為蘭嶼最早之戶口紀錄資料，同一期間，任職於總督府的森丑之助亦曾往蘭嶼考察，前後留下了許多珍貴的寫真影像資料。1905年，日本總督政府出版精細測繪後的蘭嶼番地地形圖，內容包含蘭嶼地形地勢與各社的位置分布，此為日本警備統治後的第一張精確地圖資料。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創校，土俗人種學研究室的移川子之藏教授與宮本延人、馬淵東一，以及當時為台北高校學生的鹿野忠雄等人前往紅頭嶼考察，陸續留下許多豐富的影像與研究典籍。1941年間，台北工業學校的千千岩助太郎校長，對蘭嶼傳統家屋建築進行完整的測繪調查，此為蘭嶼最早的建築調查資料。

臺灣光復後，在1945-1946年間，任職於臺灣大學地質學系的馬廷英教授率領科學研究調查團前往蘭嶼進行調查，留下了蘭嶼原初樣貌的珍貴影片資料。1948年間，美軍為因應二次戰後軍事需求，在臺灣及蘭嶼上空拍攝了航空照片影像，為目前蘭嶼年代最早的航空影像資料。1950年國防部聯勤司令部測量處製作二萬五千分之一的蘭嶼地形地圖，此為當時比例尺最高且最為精準的蘭嶼地形資料。1958年間，中研院民族所劉斌雄、衛惠林、任先民等人前往蘭嶼進行民族學田野研究調查，紀錄一系列完整的蘭嶼影像、文物及研究資料，之後並陸續出版蘭嶼相關的學術研究著作。1965年，蔣中正總統搭艦艇巡視蘭嶼，為國家領導人物訪視蘭嶼的初次紀錄。1968年，臺灣省政府頒布「開發蘭嶼改善山胞生活整體綜合第一期五年計劃」，為使家家戶戶皆有電可以燈火通明，遂興建蘭嶼火力發電廠，此後蘭嶼正式進入電力供給的時代。

1970年代後，蘭嶼歷經國家公園規劃與反對蘭嶼國家公園運動（1979-1993），以及驅除核能廢料，驅除惡靈的抗爭運動（1987）等事件，吸引許多研究者、社會運動者及攝影家到蘭嶼紀錄，而產出許多該時期的專書文獻、研究報告與攝影集等。直至近期，蘭嶼的社會民生、傳統文化、生態環境與觀光發展等議題依舊受到學術研究者相當的關注，以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為例，從90至100年度間以蘭嶼及達悟、雅美為題的研究計畫案共達86件（注5），平均每年有將近8件的學術研究案在蘭嶼進行，蘭嶼受到學術研究的關注可見一斑。

綜觀蘭嶼的研究發展史，蘭嶼因具備獨特的地理環境與社會文化，使其在各個發展階段都獲得學術研究者的關注，而恰巧地完整記錄了蘭嶼達悟社會的發展與變遷。而近10年來蘭嶼相關的數位典藏計畫，大致上延續了蘭嶼學術研究的關注層面，輔以數位的技術規格進行紀錄典藏，與蘭嶼學術研究發展具有相似的脈絡。



❁ 當代蘭嶼相關的數位典藏計畫內容

自 2002 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推動以來，原有的蘭嶼原住民物件典藏資料展開了數位化典藏、紀錄與增值服務的推動，其典藏內容包含研究文獻、文件檔案、歷史文物、歷史照片與影音資料等。數位典藏計畫之執行方式，係以典藏機構的執行需求考量，由執行者對其固有的實體典藏資料進行數位化的儲存與增值作業，因而完整地承襲了該典藏機構的在學術研究上的脈絡。

回溯蘭嶼研究的發展脈絡，可發現蘭嶼的研究成果分別歸屬於不同的學術研究者（群）中，實體資料也因而儲存、典藏在不同的學術研究機構之中。就當前的數位典藏計畫執行而言，典藏機構各自沿襲了自身研究群的學術成果與脈絡，各自將本身擁有的實體資料進行數位化的儲存與增值，於是就典藏題材——蘭嶼達悟族而言，相關的數典資料依舊分散於各數典資料庫中，其實質意涵可理解為學術研究的延伸。

蘭嶼相關的數位典藏大多是該典藏機構將所擁有的實物資料進行數位化增值與儲存，實為該機構內進行獨立研究的延伸；而以蘭嶼為題的數典計畫亦只能針對該學科範疇的知識（domain knowledge）進行典藏增值，彼此間缺乏連結脈絡，對於理解與認識蘭嶼具有一定之侷限性；而在非國家型典藏計畫中，公部門的自主典藏僅能針對其業務相關範疇典藏，而民間自主數典也因缺乏資源而僅能以小規模資訊呈現。

綜言之，當代的蘭嶼數位典藏承襲了學術研究中重視學科領域範疇與研究學群關係的脈絡，意即數位典藏計畫反映出學術研究的技術轉型，然而在本質上則依舊沿襲著相似的角色結構，同樣面對著「研究者——被研究者」、「典藏者——被典藏者」之間主、客角色的對應課題。

❁ 蘭嶼達悟族主體在數典與研究中的反思與展望

原住民族數位典藏的內容可廣泛理解為原住民族的知識內涵。蘭嶼因特殊的地理與社會條件，使其獲得各個時期研究者的關注，而這些資料在現今數典計畫的推動下，也建置成為完整的數位典藏檔案，但數典檔案在調查與數位儲存過程中，往往較欠缺該檔案所屬的文化脈絡，因此常形成彼此互不關聯的檔案資料庫，而失去了原住民的文化詮釋意義。

譬如：達悟族數典資料中包含新屋落成的影像、屋主所配戴的衣飾文物、家屋主體建築的測繪資料以及新屋落成時吟唱的古謠，此四類資料係被歸類為不同範疇的檔案，儲存於不同主題之數典研究中，彼此間較難透過詮釋資料理解其相互的關連性，因而無法結構為一個完整的達悟族新屋落成知識，成為無關聯性一般數位資料，失去達悟族文化中對家屋落成的整體知識意涵。

此外，數位典藏中的原住民族角色，依舊面臨著被凝視、詮釋與典藏的客體化位置難題。原住民數位典藏欲建構之原住民族知識系統，因而易陷於資源與權力優勢者主導之下的原住民數典想像，易與真實的原住民社會運作產生脫節。

儘管如此，原住民數位典藏仍帶來了數位使用的便利性，公共化的知識討論與生產效益，以及加值化的原住民知識學習與應用服務。蘭嶼的數典資料毫無疑問地將是蘭嶼達悟族主體發展的重要素材，期盼透過資源與技術障礙的突破，整合相關的數典資源，以做為推動達悟族自主數典的願景發展根基。

注釋

1. 劉益昌（1995）。史前文化與原住民關係初步探討。《臺灣風物》，45(3)，75-90。
2. 鳥居龍藏寫真資料研究會編（1990）。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所藏鳥居龍藏博士攝影寫真資料力夕口。東京：東京大學總合研究資料館。
3. 美船事件為1903年美籍船隻擱淺後遭蘭嶼族人誤殺之事件，後日本政府在蘭嶼設置駐在所，並逮捕10名族人懲處。參考：余光弘、董森永（1998）。《臺灣原住民史：雅美族史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4. 臺灣總督府檔案（1904）。紅頭嶼蕃人善後第一件書。
5. 90年度至100年度間獲國科會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以蘭嶼為題共55件，以達悟為題共15件，以雅美為題為16件。參考：國科會學術補助獎勵查詢系統<https://nscnt12.nsc.gov.tw/was2/award/AsAwardMultiQuery.aspx>

